

被孩子拆穿何种体验

烤饼看上去很好吃，刚刚从烤箱里拿出来，香味吊足了我的胃口。这是一块黑莓馅饼，然而，它满是糖、脂肪和白面粉，而且我与埃米利奥在一起，我不该树立一个坏榜样。薇薇安和我想要他保护牙齿，让他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但那块馅饼太诱人了，我无法抵抗自己的欲望。哎呀，我为什么要放弃这样的快乐？或许我可以偷偷买下这块馅饼，另外给儿子埃米利奥买一个全麦面包卷分散他的注意力。于是我付了钱，拿着这块馅饼背着埃米利奥开始狼吞虎咽，试图不让他看见。埃米利奥立即注意到了，一个劲儿地嚷着要吃。“嗨！面包卷很好吃，不是吗？”我口是心非地说，同时尽可能快地咽下那块馅饼。埃米利奥对面包卷毫无兴趣，愤愤地把它扔在了地上。

我被抓了个现行！要是只有我一个人，我会悠闲地品尝这块馅饼的滋味。可是埃米利奥在场，我别无选择，只能看着自己出洋相。就是这样，每天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时，我不能假装，不能撒谎，不能置之不理。有他们在身边，我不可能生活在幻想中——我必须时刻面对我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真相。

有时候在我看来，我是在照镜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的孩子们在模仿我。我知道孩子是通过模仿学习的，他们模仿我们的姿态、行为、声音，尽管他们是原创的、独特的，但有时他们就像是我们缩小的复制品一样走来走去。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我们思考问题时挠头的样子，我们拿电话的样子，我们吃饭的样子。

我们看到过孩子是如何把我们最深的感情和幻想表现出来的。而在一个较为浅表的层面上，他们直

接映照出我们。镜子是中性的、直接的、揭示性的，也是令人畏惧的，它向我们展示本相，不作任何评论和解释。

当孩子们模仿成人时，他们是好笑的，但是当我们将进一步观察便会发现，他们并非那么好笑。我们会意识到我们正在看着自己。

我安顿埃米利奥去睡觉，灯关了，时间很晚了，真的是该睡觉的时候了。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开始就说好只讲一个。讲完后，他提要来了：“再给我讲一个故事。”

“埃米利奥，我们说过就讲一个，睡觉吧。”

埃米利奥的反应令我惊讶，他的声音穿透了黑暗：“再给我讲一个故事，不然我会给你一个口头警告。”

这个勒索还不错嘛。这个孩子一直被待以尊重和爱，从未被打过或恐吓过，是从哪里学会威胁的？当然是从我这里。片刻前难道我没有说过“如果你不立即上床睡觉，你就没有故事听了”这样的话吗？是的，我发现威胁是我与孩子们互动的一部分，威胁也内在于我们很多的社会关系之中，尽管它们很大程度上是被美化了。

孩子的情绪来自大人

我又累又气。我们不该带孩子来镇上。薇薇安的状态和我一样，对这次出行追悔莫及。整个事情乱糟糟的，让人萎靡不振。孩子们饿了，我们决定在一家为游客开放的自助餐厅里吃点小吃——这种地方是我

孩子是个哲学家(上)

◆【意】皮耶罗·费鲁奇 著 张晶 译

孩子是成人世界的镜子，我们可以从日常育儿中，省察自己，与孩子一起成长，意大利哲学家、心理学家皮耶罗·费鲁奇《孩子都是哲学家》里讲述自己在身为人父后发生的心灵转变。



一直设法回避的。孩子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情绪变化。我正给乔纳森从一杯巨大的水果沙拉里挑一些吃的出来，埃米利奥犯起了淘气，从桌子下面踢着乔纳森。乔纳森生气了，弄翻了水果沙拉。我惊恐地看着水果块掉到了我的裤子上，果汁洒得满桌都是，也泼到了孩子们身上和地板上，汇成一道五彩的洪流。薇薇安沮丧地喘着气。我很生埃米利奥的气，他是这场灾难的肇事者，我抓住了他的胳膊，但他尖叫起来，报复地咬了我一口。自助餐厅里的所有目光刹那间

转向了我们。真是一场噩梦。

稍后，在所有的慌乱结束后，我回想了一下，明白了过来。埃米利奥和乔纳森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薇薇安和我的情绪。我们的感觉和欲望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它们都以各种方式传播并抵达我们身边的人身，有时是明显的，但多数时候微妙而神秘。我们传达自己的所感所想，不仅通过我们的一言一行，也通过我们的姿态、语调以及我们所散发出来的情绪。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影响了那些与我们最亲近的人，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孩子。

孩子能够清晰直接地感受到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隐秘情绪，并能比我们更深、更敏感地把这些情绪表现出来，因为他们没有防护机制。也就是说，他们比我们更易感染我们的情绪。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这种敏感常常会扰乱他们，因为他们无法依靠那些成人已经发展出来的过滤和防御机制。

孩子们不但比我们更强烈地感受着我们的情绪，而且会把这些情绪表现出来。如果孩子们感到狂怒，他们会咬人或把一个盘子猛摔到地上；如果他们感到了空气中的沮丧气息，他们会不吃早饭或尿床。他们以他们全部的自我去体验我们的情绪，又常常强有力地立刻表达出来。而我们成人则已经习得了自我保护、内爆、合理化、调节和节制的艺术。

孩子们是直率的。正如在《皇帝的新装》那个故事中一样，他们会相当直白地说出我们成人害怕表达的

内容。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内在感觉和我们想要别人如何看待我们之间存在反差。成人设法隐藏和控制自己大部分的感受，但是一个孩子会替我们将这些感受展现出来。为什么当孩子在公共场合发脾气时，每个父母亲都感到尴尬？不仅仅是因为在那一刻他们成了被关注的焦点，他们担心打扰别人或被人批评，同时也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被暴露了，他们害怕自己最隐私的生活公之于众。

有一段时间埃米利奥非常爱生气，最轻微的反对都会让他大发雷霆，然而他又确实拥有他所想要的一切。每天，薇薇安和我会花大量时间陪他，与他高兴和平静时一样，我们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表达我们对他的爱。这是怎么回事？当然，所有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困难时期，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危机时刻，不过这次却有所不同，我认识到埃米利奥的易怒源自于我。那段时间我起得非常早，每天睡眠不足五小时，我很易发怒，虽然我设法将怒火隐藏起来，但是它依然处于我整个精神状态的表面之下。为了给自己的兴趣爱好争取更多时间，我减少了睡眠时间。后果在埃米利奥身上显现出来了，他感觉到了我的易怒，并在我面前将它清晰地展现出来：这就是你的样子。当我开始睡得多了一些，就不再易怒了。我休息得更好了，埃米利奥也就更加平静了。道理相当简单：与一个紧张的有机体共生会让你紧张。

幸运的是，情感共鸣也以积极的方式出现。有些日子里，当我感觉良好并与每个人都和谐相处时，当一切看起来都格外安宁时，孩子们也反射了我的平静。在这样一个高兴、和谐、流畅、没有紧张感的日子，埃米利奥睡觉前会对我说：“今天你得了满分。”

文学的生命——我和我的作家朋友

修晓林



文学期刊。

“文革”后，丁景唐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岗位，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和党委书记，他着手抓的最重要的一项浩瀚伟大的文化积累工作，就是先影印出版当年由赵家璧先生创意策划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全套珍贵文学研究和普及资料，紧接着进行《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的编辑出版工作。正是因为景唐先生的文化眼光和出版气度，还有他良好的人脉关系、出色的个人魅力，以及他所主持工作的影响力和权威性，这才有了共二十卷计一千四百万字的第二套“大系”。新编“大系”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历史文献价值，客观而全面地反映历史真实面貌（景唐先生定下的编选原则之一，就是“大系”所选作品，均要选自最初发表的报刊或最早的初版本，力求保持作品的原始面貌，钩沉原作，就是为了恢复原来面貌予以存真），以其凝聚着文学前辈与几代编辑的共同心愿，构成独特的编辑风格和个性，这于现代出版史是一个卓然贡献。而先生的编辑生涯，正是在这座丰碑上面，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脚步。在编辑这套“大系”的过程中，景唐先生亲自出马，上门或是写信，约请了周扬、巴金、吴组缃、聂绀弩、芦焚（师陀）、艾青、于伶、夏衍为理论、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诗歌、戏剧、电影各卷撰写序言。自1987年“大系1927—1937”出版起，此后的十三年，在景唐先生战略眼光、坚定勇气的鼓舞和激励下，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接任领导，于1997年出版了“大系1949—1976”，又于2009年出版了“大系1976—2000”各辑（此辑增加了“微型小说卷”），至2009年秋天，经过上海文艺出版社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皇皇百卷、汇聚上万篇优秀作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在沪完成并全部出版，它囊括了二十世纪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优秀成果，记录了中国文学从近代走向现代的脚步，也映射了一百年来多难兴邦的民族历史，成为划时代的文化积累工程。如果说，当年的赵家璧为“大系”的出版垫上了第一块闪亮的砖石，那么，丁景唐先生就是延续“大系”辉煌成果的首倡延续接力人。

40.大势所趋

社长沈钧儒在发刊词《为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而奋斗——〈全民周刊〉的使命》一文中，提出周刊的基本任务：加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把抗战以来视抗战为单纯的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改变为全面的民族抗战。

抗战一周年时，《全民周刊》与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沈钧儒、邹韬奋以及张仲实、艾寒松、胡绳等人参加了该刊的编辑。邹韬奋撰文指出：“我们决定在集中双方的力量，发挥双方的特点，补足双方过去的不够的原则下，以统一的意志，从事更大的努力，力求我们今后对于全民动员的号召与教育上更多的尽力。”邹韬奋在编报刊的同时，还努力扩展生活书店的业务。抗战以来，生活书店在西南和西北大后方，设立了不少分支机构。1937年底，在汉口成立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制订了管理方案和出版计划，使书店的影响越做越大。

沙千里到达武汉后，继续用蚁社的名义，合法地支持抗战，宣传抗战。蚁社在武汉时，最多发展到四五百人，吸引了武汉当地的许多人士，做了大量抗日工作，参加了邹沫若担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许多活动。蚁社把许多精力放在战时教育上，开办战时训练班，学员毕业后介绍到前方。后来，蚁社遭到国民党的阴谋破坏，取消了它的合法性。

沙千里还在武汉创办了旨在面向大众的宣传抗日救亡的《大众报》。

李公朴与沈钧儒不仅创办了《全民周刊》，并且在武汉建立了全民通讯社总社，积极有效地进行抗战宣传，著成《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的小册子，他高声疾呼道：“我们对敌抗战，是一个长途的艰苦旅行，这中间是要经过许多的荆棘与障碍。我们不但不能后退，因为后退就是无路；而且也不能左顾右盼，因为左顾右盼就会跌入深渊。”

他详细地阐述了游击战与持久战的关系，就什么是游击战、游击战与正规军及民众关系、游击战的现状等展开了论述。他认为日寇不可能在中国土地上布满士兵，利用空隙，发动游击战，敌人必然疲于奔命；游击战还可

以牵制敌人，分散兵力，实行各个击破，帮助我方正规军正面应对敌人的进攻。这是李公朴抗战思想的一大进步，也是他亲临前线战场，接受中共提出的抗日主张的结果。

李公朴并不留恋大后方，1938年到达山西，去民族革命大学工作。但是到达临汾后，阎锡山不愿放手让他工作，利用亲信竭力排挤，也不兑现让他出任副校长的诺言，李公朴决意离去，回到武汉。

不想，回到武汉不久，他又遭到了一次绑架。当时国内的最大兵厂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不满工作现状和生活待遇。恰在这时候，李公朴与沙千里应邀去该厂做抗战演讲，没几天，工厂出现了罢工，工人代表被抓，社会上谣传说是李公朴和救国会煽动了罢工。李公朴不以为然，6月7日去找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主任、武汉卫戍司令陈诚讲理，驳斥国民党的谣言，要求释放工人代表。陈诚愤然地说：“在抗日战争正紧张的时候，煽动罢工，就是破坏抗战，非枪毙不可。我不只要严办工人，对于那些煽动者，我也不会客气。”

经过一场激烈争辩，陈诚把李公朴扣留在政治部，长达一个月之久。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要求疏通下，才得到释放。

七七事变后，国内要求团结抗日的政治势力终于团结在抗日的大旗下面，实行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是大势所趋。8月25日中共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召开由真正人民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吸收抗日党派、军队和团体代表，组成国家最高权力机构。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务和施政方针问题。中共向国民党中央再次建议组成包括各党派参加的统一战线组织，增强政府与民间的互信和互助，提高抗战救国的效能。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决定设置“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4月12日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7月公布了《国民参政会议事规则》。

长河秋歌七君子

潘大明

